

高等学历造假已形成庞大产业

7月8日,互动百科网评审部的负责人孔妍妍如以往一样一一审阅着用户重新提交的新版本的内容。但从中午开始,一个现象引起了她的注意。在众多提交的新版本的内容中,有关“人物”的修订量明显增多,尤其是对于学历的修改,相对于以往的增量,单是8日一天,就增加了70%~80%。此异常也引起了其他部门的关注,连公安部负责人李咏梅也来到评审部询问此事。李咏梅推测道:中国高等教育学历的伪造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在一次次打击之下,该产业的技术手段也正在不断地“与时俱进”。

假学历乱象

对中国假学历的泛滥程度,从街头的“办证”广告的数量即可窥见一斑。对于中国假学历的数量,目前并无权威的统计数字。不过,一组数据和案例颇有意思。一个是来自安徽省证书验证中心,从2001年9月成立到2005年,该中心共受理11858份学历文凭验证,发现假学历2736份,国家不承认学历468份,两项相加占总数的1/4强。另一个数据则是,从2002年到2006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接受社会各界高等教育学历认证109141份,其中查处的“问题学历”约占查询总量的9.9%。从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曾经组织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管企业领导干部共67万多人的学历、学位中发现了15000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官员热衷混文凭的目的很简单:升迁。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江西省官员胡长清学历造假事件。据报道,胡长清在位时,托人在北京中关村大街上胡乱买了一个法学学士学位,从此即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对这样

的公开造假行为,在胡长清担任江西省领导时,却从来没有公开提出过质疑。“这都是面上的问题,老鼠称王,肯定是猫出了问题,中国人自上而下,骨子里都还延续着几千等级制的思维模式和做法,而不能躺在起跑线上的唯文凭论,正是在这种土壤下滋生的一种太普通不过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表示。

两万元即可办理

要找到办文凭的代理人并不难,在百度输入“代理文凭”字样便出现90多个相关网页,记者很容易联系到一名自称“专业办理国内外文凭、教育部学历证书认证书、留学回国证明”的专才人士Q先生。按照Q先生的说法,若记者办理一张美国大学的文凭并要取得相关所有证明的认证,全套需2万元(当然不分地方和学校),按照“全规”,记者需“先把个人资料发过来,同时预付30%的定金,他们办理好后给记者看货确认再付余款”,时间需4个月左右。至于原因,Q先生表示,此次为记者办理的文凭是在相关机构查询验证的,是属于高仿的。Q先生明确表示,该证书在美国大学的验证证明无法做到,但在国内的验证体系完全没有问题。“国内用人单位都是通过查询教育部所属的一些认证体系来分辨您国外学历的真伪。”至于记者的“高仿证”能够通过认证的原因,Q先生表示,他们是通过一些内部关系办理这些事宜。而目前,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通过相关系统的验证,那就是利用黑客手段直接入侵教育部门和高校的正规网站,按照个人和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的信息数据,在网站后台数据库添加不存在的学历和证书信息。曾有犯罪嫌疑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击“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江南大学网络教育

院”等网站,向网站数据库添加公共英语三级、计算机二级、自考等各类信息2200余条,每条提成20~80元不等,共获利10余万元。

而在整个链条上,也基本是“群体”合作。较为普通的一般分为三个等级,老板、中间人和直接与客户交易的联系人均单线联系,互不认识。

对于该公司的规模以及情况,Q先生表示无法告知,“但2万元已经是超低价了,即便是团购也只能是这个价格,现在生意并不好做。一单生意层层分钱,分到每个人的手里并没有多少。”至于记者的“学历证”,Q先生表示在15周后可以拿到。

“野鸡大学”渗透

当然这只是获得“假学历”的其中一种方式。按照中国假学历的说法,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的;二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而“野鸡大学”显然属于后者。就在今年高考时,记者曾以美国一所大学在国内代理人的身份与湖北武汉的一家中介服务机构取得联系,该公司一名姓何的经理表示,公司与国内很多高校都有合作,国内外的价格均差不多,海南的生源要高一些,代理招生成功的话,一个学生一般收5000元,甚至上万元。而2009年,代理招生的价格在1500~2500元不等。

记者要做的就是将美国的大学招生简章发给他即可,整个过程,对于记者代理的是哪所大学,他并不过问。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一些“野鸡大学”前几年就大摇大摆地进军中国。一些“野鸡大学”还推出种种招生“优惠”:不用来美读书,通过中文教学就可拿到美国学位。据调查,由“野鸡大学”颁发的学位不在少数,尤其是MBA学位最吃香,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不过,国内一些“野鸡大学”的代理人也随处可见。就在高考当日,记者去了北京几个考点,在校外等候的人群中,除了家长外,还有一拨人,他们拿的是海外求学的征询表,征询的主要问题是,家庭收入情况以及对专业的了解程度,记者也是被征询者之一,最为关键的是要留下联系方式。就在记者做完征询之后,就接到对方的电话,先是了解孩子考试情况,随后,就向记者推荐一些不知名的大学。

“国内‘野鸡大学’的招生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在教育系统里并且有一定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和教育系统毫无关系,我曾办理过一个案子的被告就是账户上只有2000元的公司负责人。”曾办理过“野鸡大学”官司的教育界律师田坤告诉记者。



唯学历论的土壤

在与Q先生聊天的过程中,对于屡次“越位”的咨询,他并不是没有怀疑记者的身份,记者最终以一个“两区合并,竞争压力大,为进一步提升在单位的评价体系中有足够的资本得以提升,才出此下策。当然,有个外国文凭在手,而且还是美国的,身上自然是与众不同”的理由让其信服,毕竟,这是当下使用假学历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即,普通百姓买假证是为了找工作的需要,官员热衷混文凭的目的是升迁。

一名ID为“人民公仆一员”的网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那里国税局一名何姓正科级干部,在任职前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1963年出生的他,没参加过任何成教或自考进修,但到了1999年,他的学历居然摇身变成了“XX财经大学”本科,于是“很自然地升为正科长”。

众所周知,现在国有企业评职称,已经不仅是看工龄长短了,有时候不达到什么学历就不能提拔为什么层次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学历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有些地方提拔官员要求有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假文凭现象的顾海兵认为,这种干部任用标准准定一些“不得不去造假”,“用人单位也一样,门槛就摆在那儿,是有文凭、有工作经验。”

北京一家IT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公司每年要招多少大学生也是一个任务指标。“不会有多少人去追究职工学历的真假,但是你必须得有那么一张纸。”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news.com

“螃蟹节”凸显“政绩焦虑症”

官办活动,往往办不好活动。近年来,各地政府大事操办节庆活动,随着数量的剧增,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助长了不良风气,受到公众的广泛批评。节庆活动过多过滥,所体现出来的浮躁心态和投机心理,也折射出地方官员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症”。(7月12日新华网)

官办节庆,左右力在官,意志力在官,官员喜欢的是节庆所弄出的“动静”。官办节庆,大多像夏天里的阵雨,轰隆隆地来,又轰隆隆地去。来时热闹非凡,去时一地鸡毛。官办节庆,有各类级别。有的是爱拿历史名人说事,有的干脆把一个土特产、一种植物、一类动物、一处风景排出来叫阵。很难想到很难想象,螃蟹也能办成节庆,可一个沿海省份一年由县以上政府举办的节庆有100多个,仅冠名“螃蟹节”的就达5个。其中某地在办“螃蟹节”时离弦走板,竟搞了个“螃蟹小姐”评选。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官办节庆最冠冕堂皇的说法。官办节庆上打出的文化符号并不是真正的文化构成,而是一种切割工具。随着官员的意愿,他要个什么样,就会有样。官办节庆本身就是个戏台,还原它的本质,人们看到的是戴着乌纱有着表演人格的人又蹦又跳的表演性。“螃蟹节”表面上的主角是螃蟹,实际的主角却是节庆的主持者。在缺少政绩资源的地方,“一个土特产、一种植物、一类动物、一处风景”很容易成为一些人利用起来的政绩资源。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在短短的任期内出政绩,不是件易事,但要借螃蟹或豆腐、大葱搭台,弄出点“动静”,让上级注意到,这又有何难。敢于花钱,好事就办成了,政绩就到手了,晋升的机会也就出现了。

再好的事情也不能滥办、办滥。滥办节庆,节庆的吸引力就会降低。办滥节庆,势必毁了节庆。现在,大大小小的官办节庆已很难出彩,无奈之下,有些地方只好在排场上工夫,在攀比上求效应。费用支出水涨船高,财政入不敷出,也挡不住办节庆的激情。钱不够,就四处“伸手”,比如让辖区企业“赞助”,或集资摊派。电视上有影,报纸上留名,只为个人形象。劳民伤财,只为己之利。官办节庆,无关民生之事。多数情形下,是拖累民生,损害民生。在功利之心的驱使下,大办节庆,政绩光环罩不住民生之痛,光鲜外表掩盖不住民生之艰。以为以之名办节庆,其情不堪,其理不通,其祸不断,其害不浅。从制度设计入手,停办那些无聊的官办节庆,才是最好的办法,舍此办法似无更好的办法。 今语

“名人经济”早该规范了

你搬出西門庆,我就搬出潘金蓮,连孙悟空也有了故乡。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巨大财力、人力造假大空的人文景观。如果让这种做法发展下去,肯定会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带来打击,未来,我们将无法对于孙交代。

文化部的规范可谓是一个响亮的批评,文化不是小姑娘,可以任由人们打扮;经济发展也不是低三下四,不择手段,而应该遵循规律,挖掘亮点。规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曾有的错误做法,更是为了告诉人们,争奇斗艳的做法是为了发展经济,是为保护文化、继承文

裸体何以从“艺术”走向“经济”

原定7月3日在清远黄腾峡漂流景区举行的“美女裸漂”活动日期重新确定为8月3日。7月9日,清远黄腾峡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美女裸漂”活动引发的争议与质疑,回应媒体。(《南方日报》7月13日)

尽管景区方面再三强调这是“艺术”,并非低俗和商业炒作,但实际上,恐怕地球人都明白。这些年,靠“裸体”来招徕眼球进行商业运作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譬如前不久某地推出的所谓“裸体纤夫”。但凡裸体,虽都被冠以了艺术的高雅名义。当然,裸体艺术真正正是一种行为艺术,只不过在我们这里却从“艺术”走向了“经济”。

现代行为艺术兴起于西方,这些年裸体行为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当一些人将古怪的裸体行为艺术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也狠狠地撞击着人们的感官和精神承受极限。原因何在?不能不说我们封建和封闭,只能说传统和数千年的文化与道德范围,在很多时候,并不合适让这种从西方舶来的裸体艺术大行其道。

有人说,我们要树立健康的裸体审美观。“翻开历史,我们会看到,在古希腊的运动会上,男女运动员都是裸身出场,自信地亮出自己健康的身躯和体魄;我们也会看到,十八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也是从裸体美的展示开始的。没有欣赏人人体美的能力,就没有对生命

的肯定和热爱。”这种观点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却忽视了一个根本:中国不是西方,我们终究不是老外。古希腊人可以裸身出场,但我们的老祖宗却做不到,所以如今西方人可以裸体见怪不怪,国人接受起来也有些难度。

因此从一开始,这种在海外早已“日薄西山”的行为艺术,被国内一些“艺术人士”照搬起来,其动机就值得玩味。任何艺术都植根于文化的大土壤,要考虑到公众的接受水平,也要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但却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说白了还是哗众取宠和炒作,而艺术不过是利益的遮羞布罢了。换言之,一些人之所以捡起洋人丢弃的旧衣钵以此为乐,本就是“裸体搭台、经济唱戏”,艺术在被“强奸”,而有关方面在数着大把的钞票偷乐。

况且,并非所有与裸体沾边的行为都是艺术,我们只能说某些裸体行为是艺术。倘若不分具体情况,以为凡是裸体都是艺术,那么何不去澡堂中,那里可算是“艺术”的天堂了。再次回到新闻上来,风景区搞什么“美女裸漂”,这叫哪门子艺术?我看,吸引来的恐怕只是猎艳和好奇的眼球,而不是艺术的探究吧。

拿裸体当艺术的西方人不靠裸体挣钱,不拿裸体当艺术的我们却利益驱动乐此不疲,严格说起来,这不是裸体艺术的异化,而是价值观的扭曲和人文信仰的缺失。 陈一舟

化,注重为国民提供醇厚的人文气息,让现代人得到博大精深、令人震撼的文化熏陶,得到文化、经济和精神等多重发展。这才是可持续发展,也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过:“我们今天真正在好像争抢名人,争抢各种各样的故里,看起来很热闹,但是真正缺的就是对那种精神文化的把握。”名人故居不能随便叫,要叫,必须拿出真东西,对无中生有的“名人故里”,该否定的就要否定,该纠正的就要纠正,这是对疯狂开发的纠错,也是对畸形文化发展的纠错。让“名人经济”开发走向规范和健康。 雷振岳

一个吴起靠理念一群吴起靠制度

陕西吴起县表示将在全县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引起了强烈反响。近日,山东、江苏、广东等省市部分区县领导、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难以效仿(7月13日《新京报》)。

吴起县委书记冯振东的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总结“吴起模式”时说,“免费教育”能否推广是一个理念问题,公共财政支出是一个“蛋糕如何分”的问题,我们只不过是“蛋糕”优先向教育切块分配。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民生理念,“吴起模式”很难推行。对于政府来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用在这里用在那里,你只能发道德感而无法加以制度指责。尤其在当前经济优先的现实下,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在发展上,还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正是因此,“吴起模式”让人感到可贵,“吴起模式”背后的民生理念更让人心动。

一个吴起靠理念,然而,我们如果想要一群吴起的话,仅仅强调理念恐怕是不行的。

苏州市一位县级副市长说,与吴起县相比,她所在的地方财力雄厚很多,但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外来人口子女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广东河源市一位副市长说,他们与吴起县的财力大体相当,但学龄人口超过20万人,是吴起县的10倍。山东省一位县长的话更是质朴得刺人,他表示,上级政府的考核主要是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硬指标”,“我的任期也就四五年,抓经济看得见、摸得着,抓教育则见效慢,吃力不讨好。”这些话虽然让人觉得沉重,但却是沉甸甸的实情。虽说这其中还是体现着理念的问题,但如果就理念谈教育,恐怕“吴起模式”永远不可能大面积开花。

这里面,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度问题。制度和理念有同有异,同者是,制度本身是理念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不同的是,理念体现的是个体的理解,但制度体现的是集体的理解;而且,制度本身比理念更为可靠,更有保证,更具约束性。如果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也成为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如果免费教育能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砝码,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吴起模式”将会在全国开花结果,公众对于吴起的敬仰将转变成普遍的敬仰。

只谈理念不谈制度,这样的理念本身就很不可笑。如果我们希望“吴起模式”只发生在一个县,那么只需对一个县提出民生理念的要求;如果我们希望“吴起模式”发生在一个省甚至全国,那则应该从更高层次提出民生理念要求。想要在更高层次上落实民生理念,那就必须靠制度,通过制度设计来保证地方对民生事业的重视,改变“抓教育则见效慢,吃力不讨好”的现状。

一个吴起靠理念,一群吴起靠制度,没有制度,吴起模式只能成为一个县的风气,而不会成为一个省甚至全国性的风气。 毛建国



抄手为谁“代考”

《长江商报》报道,武汉一教育中介招聘“抄手”集体代考,抄各种考试试卷,不费脑筋,照答案抄就行,抄一份卷子四五块钱。武汉这家“教育中心”雇一批职业抄手参与集体“代考”,究竟是“代”哪些“学员”来“考”呢,新闻报道没有明说。但是,仅据这些抄手“代考”的一些科目有《邓小平理论》、《行政管理学》、《国民经济核算》等项看,被“代考”者,很可能是些企图获取某种学历以晋升职称并谋取职位的在职人员,而且其中未必没有公职。已经渗透于各种社会层面包括各类考试考场的造假作弊现象,显然到了有关方面必须痛下决心严加整肃的时候了。为社会和谐、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考虑,有必要将打假行动引入到各个领域包括导致社会上假文凭泛滥的用人制度中去。 吴之如 文/画